



史海回眸

如东历史上的疫情防控

□程太和

一、疫情

如东历史上霍乱、天花、伤寒、痢疾、疟疾等传染病时有流行。明崇祯十三年(1640年)、十四年,连续两年大旱,病死者甚多。《中国荒政全书》中《亥子饥疫纪略》篇载:“乾隆乙亥(1775年)春日,霖雨不止……得病者不费时日,最多者七八日或二三日,甚有朝犹遇诸涂(途)而暮已闻讣者。”“掘港场神鬼白昼现形,銮舆仪从,人往往有见之者(可能是病人的幻觉)。”“街巷所见,丧服者十之七八,门首报丧者十室而九,且有一门而贴数丧报者。”“医者肩舆、前后恒随数十人。每过街巷,悉呼号拉视。”“村庄瘟疫,多以渐而至。一家病,则合村皆病,次及他村。”“有一家六口同疫死,邻里往验之,得七尸,其一乃偷儿也。盖偷儿入室时,一触其秽即死。”由此可见,其时疫病之猖獗。清乾隆二十四年(1759年)夏,大旱之后大疫,凡尸无免者。道光六年(1821年),夏熟后连续发生瘟疫,每日有数十人死亡。光绪二十八年(1902年)秋,霍乱(俗称“瘪罗痧”,又称“麻脚瘟”)流行,居民中染病者很少得救,严重者全家死亡,有的为亲友办丧事而染病,甚至为死者超度的僧人也染病卧床。民国9年(1920年)秋,掘港等地霍乱流行,掘港死亡300余人。民国14年7月,掘港鼠疫流行,死亡80余人。民国16年夏,掘港霍乱流行,最多一天死亡17人。民国25年9~10月,恶性疟疾大流行,据当时上海《光华医学杂志》载:“恶性疟疾始发于双甸、岔河、马塘、掘港等地,迅即蔓延全县(指当时的如皋县,今如东县大部分乡镇从原如皋县划出),农村多于集镇,其猖獗之势不减鼠疫,其发病率、病死率之高,颇为惊人……”民国27年秋,掘港登革热病流行,十室九病,少有幸免。民国30年,天花大流行。民国35年夏,霍乱流行。

二、防控措施

明代,民间已广泛采用鼻腔内喷吹人痘痂末的方法预防天花。清末,自西方传来接种牛痘苗法,逐渐取代了“人痘苗”(亦称“鼻苗”)。民国时期,掘港镇已有专门替儿童接种“牛痘”的门诊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党和政府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,卡介苗、流行性乙型脑炎疫苗、流行性脑髓炎菌苗、麻疹疫苗等免疫制剂相继问世,在南通地区推广使用或试用者达20余种。1950~1956年,经牛痘疫苗接种、霍乱疫苗注射后,制止了天花流行,控制了霍乱流行。1956年6月,如东县脊髓灰质炎防治站在掘港镇南芳泉庙建立,配专职医护人员,9月,设简单病床10张,后增加到45张。1955~1964年共收治病人716例。1963年,开始用减毒小儿麻痹症活毒苗苗进行人工自动免疫。其后每年列儿童计划免疫。1958年后,如东县各公社(乡镇)医院设有专职的防疫人员,同时设立防保组。1959年,如东县认真贯彻执行“预防为主,减少疾病”的方针,基本完成和超额完成预防接种和普查普治任务。在冬季白喉病流行时,掘港镇组织45人的专业预防队伍,控制全镇所有桥口、车站、轮船码头、旅馆、饭店、会场等公共场所,对来往行人进行青霉素喉头喷雾。同时,对辖区内的机关、工厂、学校、商店、居民等都全部使用青霉素喉头喷雾消毒,达12.56万人次。并动员各单位工作人员服青霉素含片、土牛膝根汤,吃白萝卜,戴口罩。对发生白喉病的单位和接触过患者的单位,都使用碘干油涂布等方法预防,对患者采取隔离治疗。卫生部门对在饮食行业、商业食品柜台、单位食堂工作的人员普遍进行体格检查,有效控制各类传染病的发生。60年代初,如东县连年遭受涝灾,蚊虫猖獗,疟疾发病率大幅提升,掘港镇医疗单位除治疗现症病人外,专门建立疟疾防治组织,培训送药员,对患过疟疾病的患者,进行抗复发治疗和预防性服药,并结合以除“四害”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,大力灭蚊,消灭蚊虫滋生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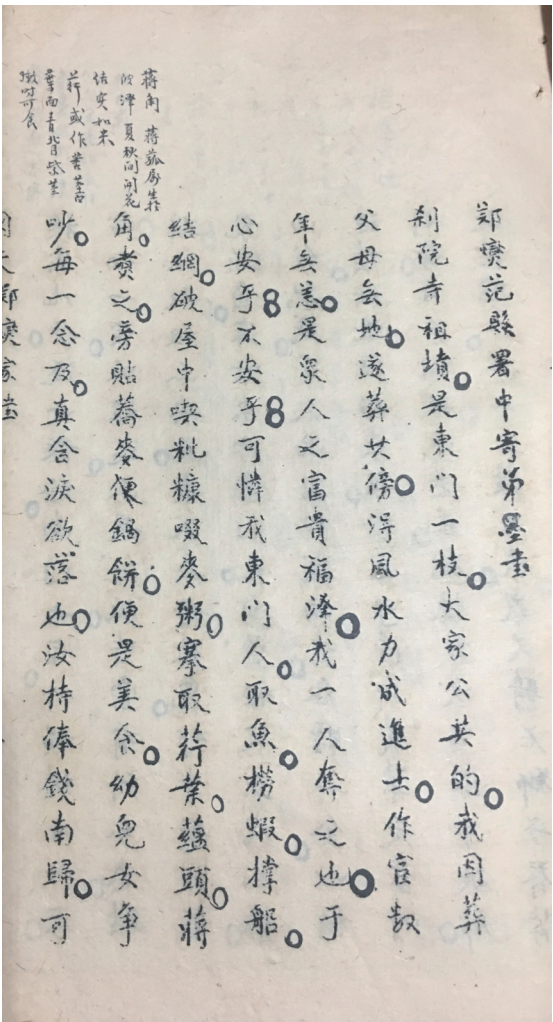
1965年2月,如东县流行性脑膜炎大流行,掘港镇采取紧急措施,从各单位抽调60多人,在公共场所及入镇的各交通要道设立13个喷喉站,对所有入镇人员全部喷喉,还训练100多名义务保健员(志愿者),挨家挨户送药1个多月,喷喉8万多人次。同年4~5月间,掘港镇32个居民小组中,162人感染伤寒,江苏省及南通地区有关部门十分重视,派出10多名医务人员到掘港镇指导工作,帮助控制疫情。此后,每年对群众进行伤寒三联疫苗预防接种。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,为如东县急性肠道传染病发生高峰期,如东县各医疗机构设立肠道门诊,对疑似病人进行粪便采样检查,对阳性粪便健康带菌者和少数阳性病人建立疫点、疫区。组织专业队伍,专职负责阳性病人或带菌者就地隔离、消毒、治疗。就地扑灭和控制急性肠道传染病扩散和流行,切实保障人民的身体健康和安全。

征稿

“城市记忆”设有传家宝、老照片、史海回眸、地名掌故、江海风物、老建筑、习俗杂谈等栏目,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。来稿尽量图文结合。投稿邮箱:574911059@qq.com

寻找董小宛画作的收藏者刘季亮

□彭伟



上图:刘季亮
右一:刘季亮手稿《植物参考》
右二:刘季亮批校的油印教材

历史人物



近阅沪上旧报,看到一则有趣的报道《董小宛遗画之价值》(刊于1922年10月22日《时报》),抄录如下:

才妓董小宛,工诗画,但遗传者至今者甚少。南通敬儒高等小学校教员刘季亮先生有董小宛遗画一幅,约一英尺见方。上绘有青石一块及修竹数枝。前日来一画贾求购。刘君索银二百两。该贾只愿出洋百五十元,争执几一小时,但终未能成就也。

作为如皋人的我,对于董小宛的名字,可谓如雷贯耳。她与名士冒襄的爱情故事,早已流传于如皋的大街小巷。董小宛还以才媛名世。她的画作传世甚少,今日所见不乏赝品。无锡市博物馆藏有一幅董小宛的《彩蝶图》,为不可多得的佳作。新世纪以来,多幅落款“董小宛”的画作,屡屡“惊现”拍卖会上,但其中有几幅真迹吗?南通刘氏旧藏的那幅真伪也难断定。如果今天还能见到,多少可以有助于判断。

刘季亮的名字于我既熟悉,又陌生。那是十余年前的一段购书旧话。一位海安书商从如皋废品站淘到一批署名刘永明(季亮)的手稿及油印教材。其中一册季亮手写的敬儒高小自编理科教材最为珍贵,书名是张謇的真迹,书中还有南通师范允慎铭的亲笔校对。书商很精明,将此册上网高价拍出。他知我

喜好通如乡人的旧著,便将剩余的十余册旧书,送货上门——供我选购。其中三册为季亮遗物:《植物参考》1册,为季亮毛笔教材稿本,写在“敬儒初级中学”的写字本上;另两册均为民国油印本《国文》,一册是季亮小楷批校本,封面上留下“国粹 季亮读”的字样,另一册批校甚少,不过书末订入数页“南通师范学校”用纸,抄有《可楼记读后》等文,钤印“刘永明”。除去这三册,其余油印教材封面上写有“商校刘延琅”。我猜想刘延琅也许是刘永明(季亮)的儿子,不过两人的生平,一概不知。书商伶牙俐齿,鼓吹“刘永明”是南通教育界的名人,说他还参与新文化运动云云,索价数千元。我喜乡人墨迹,见到书中天头上的蝇头小楷写得清秀端庄,颇有功力,便咬咬牙买下这批刘家的旧书。

刘季亮是什么人?多年来,这个问题一直萦绕我的心头。幸运的是,因为撰写发表关于如皋籍教育家杨同芳先生的文章,我有幸结识正在撰写南通市第二中学(前身为敬儒中学)校史的陈康衡先生。他与刘家后人相识,向我介绍:刘永明(1897—1931),字季亮,泰兴人。南通师范学校第十一届(1912—1917)毕业生,1919年入职敬儒高小,任教博物。其子刘延琅于2019年离世。

笔者在1915年第2卷第5期《学生杂志》上还读到一首南通师范学校二年级学生晋易康所作的《寒假别刘季亮》:漫天风雪上河梁,不是离人也断肠。相对须臾一挥手,明朝回首各茫茫。至于季亮通师毕

业后,来敬儒执教,大概与马极良先生有关。陈康衡先生所赠《百年敬儒——南通市第二中学校史》中记述,1919年9月1日,敬儒高小开始授课,马极良任主事(校长之下主持校内事务者),刘季亮为博物教员。

马极良,字眉伯,生于1895年,如皋东乡北坎人。他来敬儒高小之前,教育履历相当丰富,于民国初年参与创建马塘组织教育会,后又在马塘、如皋两地任职小学、中学教师。马先生当是通如两地的教育名人,他还任过如皋县教育局教育课长等职。1921年,他在《敬儒高等小学校理科教科书·序》中述及办校不易,以及友人兼同人季亮的贡献:

高小第三学年理科教授,每周仅规定两小时,全年统计,所授未免太少,乃变通增加,倍其教焉。但时数定矣,器械备矣,教科书将何取乎?此则重要之问题也。吾友刘君季亮长于此科,以各书局发行之理科教科书教材寡少,不适于用;且与本校置备之器械不相应合也,乃于暑假期间,挥汗编成此书……吾知各高小校若无适当之理科教科书,当与本校相同,斯书虽专为本校应用而编,然而刘君不私版权,固愿公诸一般之高小采用也。

这套刘季亮编辑的理科教科书分为上下两册,包括物理、化学、生理三科。由此,笔者所见两册季亮的教材稿本(《植物参考》)可能也是这个时期(20世纪20年代初)完成的。

刘季亮在南通师范读书时,对于博物学就很有兴趣。譬如他在阅读古文时,就十分注意掌握相关的植物学的知识。典型的例证是他阅读郑板桥《范县署中寄弟墨书》时,对于郑板桥

感慨兴化乡人所食植物,分别批注:1.蒋角,蒋狐属,生于波泽,夏秋间开花结实如米;2.荇或作莠茎,叶面青,背紫茎,嫩时可食;3.蕴与蕴通,一名聚藻……此类的注解,无不说明刘季亮对于博物学兴趣十分浓厚,为他日后出任博物学老师打下基础。刘季亮不仅善于编写教材,对于儿童教育学也有研究。1919年,即创办敬儒之年,刘季亮通过教学实践,撰写研究文章《低能儿童补救方法之商榷》,刊于《南通县教育汇报》。

1929年初,刘季亮从敬儒辞职,不过敬儒师生未曾忘记他。他昔日的同事季咏沂的《春和存稿》中录有《挽刘季亮》:“早勿归,迟勿归,此日偏归,命也,命也;生不返,死不返,至今未返,天乎,天乎。”此联前有识语:“刘为敬儒同事,死于大德轮船之难,觅尸不得。”

《上海长江航运志·客货运输·运输安全》记载,大达轮船公司的“大德”轮第93航次在上海载货1052件,载客342人,于1931年12月12日夜开往扬州,至13日午前11时45分行经江浦附近七望沙康纳执浮筒江面时失火燃烧,当即抢滩抢救。前来救援的船舶有“湘潭”“宜昌”“平和”以及其他大小民船等。有的乘客上滩得以幸免,经竭力抢救,大部分乘客脱险。“大德”轮船员130余人,连同旅客342人,共约500余人,救出424人,遇难身亡60余人(其中被火焚烧,死尸10余具,捞获死尸42具),余者下落不明,死难惨重。据刘季亮后人追忆,刘季亮是跳江而死的。

因为这一惨案,刘季亮过早离世。而那幅刘季亮旧藏的董小宛画作如今又散落何方呢?

唐家闸露天旧货市场

□刘根旺口述 严金凤整理

江海风物



我想说的唐家闸的露天市场,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唐家闸的一个新生事物,说明唐家闸工人族群生活水平开始提高,可以购买一些好东西装点门面了,用新家具来改变居住条件就是最典型的缩影。旧货市场怎么形成呢?我们知道,建国初期,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与协助下,唐家闸由张謇创办的5个厂,先后开工,尤其有七八千职工的大生一厂,生产蒸蒸日上,工人的工资再不是过去做一天只够买三块缸缸,已经能够养家糊口,还稍有结余。特别是女职工,推掉了头上压迫的三座大山,还摆脱了夫权的束缚,彻底地翻了身,成了名副其实的半边天。那时,大生一厂女

职工非常吃香,上下班不少女职工,由丈夫推小车来接送。一个贫困家庭,只要有女职工,她难得有可观的收入,在结余的部分,按港闸人薪火传承,代代相继的特点,不把钱乱花,总想能给晚辈留点什么,能想到的,当然是时髦的家具,用以改善居住条件,和家庭日常生活。

1951年下半年,海安、如皋、东台以及盐阜扬淮等地早已听说唐闸镇又开始兴旺起来,工人生活提高很快,看准了难得的商机,将土改分来的“浮财”或急需钱用的人家,忍痛割爱,开始运来精工细作的桌机,到唐家闸销售,没有地方,就放在广生街,老百姓习惯称为油坊厂弄子,紧靠在榨油车间和油饼仓库中间,不用人指点,自行摆放的自由市场,也没有人管理,也没有人来收费,基本上就是露天旧货

市场。只要旧家具一经上市,就很快销售一空,生意买卖很好做。旧货价格也不贵,经过讨价还价,很快成交。一些有着经商头脑的小贩,也就“得了芝麻就打油”,竟将收购的旧家具用船装水运送到唐家闸来。从1951年末到1952年上半年,广生街两侧所摆放的旧家具几乎达到中间无法插足的程度,品种多样,家具有挂衣橱、红木床、螺旋转椅,红木桌椅,到床后有暗橱,床前有捲掀,前后拔步雕花床,小巧玲珑的瓷粉缸,花碗、菊花型菜盘,瓷碟和摆设的煤纸瓷花瓶、观音神像,以及自鸣钟、香港造型,高达80公分的老挂钟,一应俱全。这一来住在唐家闸周边乡村的职工,每户总得至少要选上一两样。

通过观察与调查,殊不知在这些旧货中,不少竟是文物,当时卖的人不懂,买的人更不懂,比如闸西乡国庆村大个儿施文

姑娘、赵宝清买了12只大海碗,花纹也不奇特鲜艳,而在碗底铸有却是明朝正德年间烧制的。前几年让文物贩子知道差点跑穿几双鞋底,吓得赵家偷偷将碗转移到秘密珍藏的地方。

露天旧货市场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,至1953年末1954年初,历时二三年,慢慢地收官,最后在大洋桥下等几家旧货商店先后兴办,露天旧货市场便在无声无息中停业。

原江苏省化工厅技术处处长缪顺治,于2019年4月在唐闸古镇办讲:我是1953年进厂的,对当时的旧货市场不大了解,但对我印象最深的在油脂厂东北角约1.5公尺宽的小弄子口,有个卖旧货的大个子,他的颈项一条约10公分的血疤,很明显,听说日本侯在时挨鬼子砍了一刀,幸亏头不曾挨砍落下来,之后又长起来,而活下来的。